

全球智库半月谈

简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亚洲的实力与秩序

超级条约——大型经济体间的区域贸易协定

货币联盟中的协调和危机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产品创新

习—莫迪会谈：一种新型的中印关系？

本期编译

陈 博

黄杨荔

孔莹晖

刘天培

刘兴坤

李 想

马文龙

苏 丹

沈仲凯

许平祥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iwepceem@163.com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简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3
-------------------	---

导读：围绕刚刚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文分析了中美双方各自的关注点，以及本次对话的主要议题，并就双方如何推进对话效果提出了建议。

欧洲：在加强监管和金融抑制间的两难选择	5
---------------------------	---

导读：金融危机给欧洲的金融体系带来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府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政府同情金融机构，并对其加强监管；二是认为政府反对市场机构，通过金融体系为自己谋取利益。首先，我们认为，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完全正确。其次，政府的作用受到历史的影响。最后，我们分析了欧洲金融架构和联合银行对欧洲金融生态体系配置的影响。

全球治理

亚洲金融的未来：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与基础设施需求	8
---------------------------------	---

导读：近几十年来，亚洲面临着人口结构变迁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两个重大挑战。本文作者认为，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一体化，亚洲的金融部门可以在应对这两个挑战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强调金融发展的好处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亚洲的实力与秩序	12
----------------	----

导读：亚洲地区敌对和冲突与日益增强的经济合作和社会建设并存，本文深入研究了这两种动力的内涵及对美国政策的启示，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经济政策

超级条约——大型经济体间的区域贸易协定	15
---------------------------	----

导读：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不少涉及全球超大型经济体，我们将这些协定称为超级条约。作者通过考察正在进行和潜在的超级条约，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可能会有分化，但条约一旦签订，对增长和贸易的作用都非常巨大。同时，中国所受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贸易以维持增长。

货币联盟中的协调和危机	19
--------------------------	----

导读：本文是一篇工作论文，主要分析了在主权债务市场存在潜在展期危机时，货币联盟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特征。作者首先描述了在缺乏承诺条件下导致的财政外部性，即引起成员国过度借贷；这种外部性支持了货币联盟中强制性债务上限的合理性。然后，考察了货币联盟中债务构成如何内生地影响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发现当高债务国家加入中等负债的混合联盟，且其他成员都是低负债时，将带给该国更强的危机免疫能力和更高的福利水平。本文的结论挑战了传统理念，即所有国家都偏好于拥有低债务成员的联盟。这些结论为当前债务危机中的最优货币区标准提供了新视角。

聚焦中国

对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担忧	22
-----------------------------	----

导读：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 10 个省（市）地方政府今年内可实施自行发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我国正在探索地方政府发债新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稳定、规范的发债渠道，逐步向自主发债模式过渡。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市场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开闸”存在担忧。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产品创新	24
---------------------------	----

导读：作者对产业集聚与产品创新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能够促进中国的产品创新，而地方化经济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的政治改革：选举、公共物品和收入分配	27
-----------------------------------	----

导读：为解决对地方官员监管不力的问题，中国在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采取了乡镇选举的政治改革。此项措施不仅对提高地方公共物品的投入有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总体上起到了对地方官员更好的监控作用。

战略观察

习—莫迪会谈：一种新型的中印关系？	29
--------------------------------	----

导读：在最近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习——莫迪会谈反映了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以来，中印关系的好转。两国关系会限制于经济因素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新变化呢？

本期智库介绍	31
---------------------	----

简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Nicholas Borst/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围绕刚刚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文分析了中美双方各自的关注点，以及本次对话的主要议题，并就双方如何推进对话效果提出了建议。编译如下：

上周，中美两国在关系的持续紧张中迎来了高层双边会议。竞争与合作相伴，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特征，但是，近几个月来，这两个元素之间的平衡有所偏离。与美国盟友的领土争端以及一项正在进行的网络战，是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双边关系的总体状态，很少人寄希望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方面谈判，大都认为其不会带来大的突破。峰会后，联合简报中的结果也基本证实了上述预期。

近几个月来，双边汇率的问题再次抬头。尽管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贬值一直很温和，但是，这代表着重要的转变——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尽管有几次干扰）的趋势开始扭转。美国国会与舆论认为，中国在经济疲软时期可能会实行竞争性贬值，为回应这一质疑与压力，美国财政部一直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而中方一直认为，外汇走势主要是市场驱动的结果，出现双向运动是很自然的，因为货币已接近均衡。然而，中国人民银行保留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力，以便同其所认为的过度涌入的热钱战斗。

联合简报的言辞表明，有些问题已初显好转。中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一言辞意味着美方在外汇问题上的胜利，但也无需中国人民有所行动——事实上，结束干预名义外汇的承诺，是去年秋季周小川提出的既有政策目标。

中国还在美国财政部一项长期“眼中钉”问题上做出了微小承诺：此前，人民银行拒绝通过IMF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报告其对外汇的干预。美国希望中国拥护这一公布标准，因为这要求对中国央行的干预行为进行更为及时的公布。中国同意“在技术上准备”加入这一项目，比去年“积极考虑”SDDS的承诺有所升级。

经济议程中的另一主要事项是双边投资协定（BIT）。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该事项的最大突破在于，中国同意商定一项高标准的BIT，并以提出负面清单的方式实现了投资核准。而接受负面清单的框架就意味着，在所有未被明确禁止的部门投资都是允许的。这代表中方的重大转变，具有显著增加外国企业进入市场的潜力。

今年，BIT方面的公告没有重大突破，但为协商进程陈述了更多具体的目标。双方将于2014年底“就协议的核心问题与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在2015年初

就负面清单的细节“启动谈判”。自去年公告以来，历经一整年后，这一协商仍处于初步阶段，可谓令人失望。

本次协商还在其他领域取得了进步。中国承诺，让市场在几项重要部门的定价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包括石油、电力和天然气。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让步，因为这是去年秋季三中全会的部分内容；然而，从在国际环境中重申这些承诺的角度看，这也表明中方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关于去除部分部门对外资的限制的承诺，上述判断也同样成立，这些部门包括老幼护理、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务与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强健、互利，但合作范围的拓展被基础性的不对称限制了。美国市场已经或多或少向全球开放，因此，美国人无法再“给”中国人什么了。相反，大部分中国经济都被“包裹”着，是外国企业的“禁区”，或对其存在部分限制。因此，让步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核流程的改革，以及对 IMF 份额改革的支持，是中国主要关注的两项议题。在此方面，美方却无法提交结果。这些行动要求国会的合作，但奥巴马政府不太可能接受这些行动，即便其决定赋予这些议题高度优先权。而这引发了更大的问题：近期，我们能对双边经济关系抱有多少期待？无疑，贸易和投资将持续增长，但双方都将继续以国内的考虑为主制定经济政策，而不顾联合声明的内容。新一届中国政府似乎承诺要改革，但这些新政策可能以逐渐的、选择性的方式展开。这不仅将令美国政策制定者沮丧，也将限制双方在全球水平上的合作范围。中国采取的新国际行动，如之前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可能收到美方的冷淡回应。

在经历对战略与经济对话多年的高度预期后，双边经济关系已达到稳定而较不活跃的状态。协商将快速进行，但进展只是增值性的，无法达到转折性的效果。受限的经济伙伴关系不仅是糟糕的，还带来了一些担忧——从恶化的战略关系上看，经济关系能否继续作为粘合整体关系的“胶水”？若要使对话复兴，则需由包括国会在内的各方共同承诺，提高门槛，并拓展未来经济伙伴关系的合作范围。

本文原题为“Taking Stock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在加强监管和金融抑制间的两难选择

Stefano Pagliari, Shahin Vallée and Éric Monnet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金融危机给欧洲的金融体系带来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对政府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政府同情金融机构，并对其加强监管；二是认为政府反对市场机构，通过金融体系为自己谋取利益。首先，我们认为，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完全正确。其次，政府的作用受到历史的影响。最后，我们分析了欧洲金融架构和联合银行对欧洲金融生态体系配置的影响。编译如下：

1、简介

在金融危机的长期阴影中，评论家对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采用了 70 年代的“加强监管”和“金融抑制”两个术语来描述这些关系。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两个极端远远不能完全概括所有情况。欧洲金融体系的历史告诉我们，政府、央行、公共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每每会加强或减弱不同金融生态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影响。Andrew Shonfield (1965) 指出，那时的金融体系差异很大，关系更为复杂。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资本流动限制取消、单一欧洲法案的签署、欧元的诞生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欧洲金融体系已经大为同质化。但是，宣称复杂的欧洲的金融生态结构消失还远远未到时机。我们在文章中会分析现存的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的结果。

2、银行与政府：跨越大西洋的竞争

美国与欧洲对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态度总是不同。美国总是在怀疑势力强大的银行是否应该参与到政治中。这可以追溯到 1791 年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对于国家第一银行的争论。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金融业本身就削弱了对市场、产品、机构的监管力度。”这主要是通过政治游说实现。这使得评论家在分析两者关系时使用了“加强监管”的套路。但这更多适用于美国。在欧洲，金融机构不能拿到那么多的金融资源来收买政客，这使得它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公共部门。

虽然欧洲的金融机构不能像美国的那样能掌握看得见资源，从而参与到政治中，但是它们挖掘了更广泛的渠道和更隐秘的资源。欧洲不同的金融生态体系的结构特征强化了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力。比如，2009 年掌握全国 33% 的资产的德国公共储蓄银行由地方政府控制。另外一个特征则是欧洲政府非常依赖银行信用为实体经济与主权债务融资，这使得银行对于政治有格外的影响力。在应对欧洲金融危机中，这个机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由于银行对实体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全欧洲实施巴塞尔 III 协议期间，银行使得政府满足了银行自身的要求。

总之，美国与欧洲的金融机构在影响政治的过程中手段不同。欧洲金融生态体系的结构特征应当扩展“加强监管”的含义。这种生态结构包含着政府与银行

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点与美国特别强调来自银行的影响不同，是我们下一部分讨论的重点。

3、金融生态体系的历史观点

1870年，德意志银行股份公司成为德意志帝国挑战不列颠银行的工具。上个世纪，欧洲政府极为慷慨的支援银行以求回报，而银行家与政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成为了润滑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银行关系帮助政府通过非竞争的手段分配了银行信用。但大萧条与二战之后，银行紧紧地被政府掌控，信用功能则转移到了公共信用机构。西欧在二战之后将银行转变为实现政策的工具，这与发生在七十年代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抑制”不谋而合。政府逐渐把银行当成弥补赤字的手段。为了抵消银行操作、政府政策的风险，政府与银行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渐加深，最终形成了共生关系。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金融自由化和银行独立的好处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共生关系开始破裂。金融体系结构开始重组，金融市场重新开放，资本开始流动。共生关系在世纪之交逐渐淡化，那么金融危机是否标志着它的全面结束呢？

4、欧洲金融危机与国家生态体系重组

突然出现的跨国资本流动的阻断导致了近三年的金融国家主义重新抬头，欧洲金融体系重新洗牌。政府重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如果欧洲政府没有采用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政策工具，那么公共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关系会被重新定义。

欧洲银行举棋不定会使得国债陷入紧张的局面，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弥补赤字。此外，各国国债的私人持有量都所有下滑。这些现象其实与金融危机无关，是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所有的趋势。欧洲各国央行的地位下降也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塌以来的趋势。实际上欧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因为史无前例的银行信用流向私人经济部门的结果。这与美国和英国的国债持有结构完全不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银行能够用这种办法支撑整个经济的运行。

发展银行成为了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新的合作形态。从2008年到2012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发展银行的资产增长了至少30%，而欧洲金融资产机构整体的资产只增长了4%。发展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明细揭示了它们的不同功能，包括流向公共部门、主权债务或国内债务。这些机构本质上加强了欧洲过去一个世纪的那种金融生态体系。毫无疑问，国家银行持有公共债务、中央银行的信用流入私人部门的态势将恢复。

5、欧洲金融生态体系与迈向统一银行体系

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一直被形容为“体系之间的战争”。英国崇尚自由市场，而即便是国家控制为主的大陆国家，内部也分化各异。金融危机实际上使得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交互机制更加稳固。重新监管的巨大浪潮使得之前通过泛欧洲组织努力建立起来的统一市场重新破碎。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重新建立统一的银行联盟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这个要求又与各国的目标不能兼容。这种紧张的局势解释了国内的利益对立。未来是迈向统一还是分化？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6、结论

未来有两种趋势。一方面银行业务萎靡导致信用会主要来自非银行机构，从而改变了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目前限于各国国内的金融发展态势会进一步整合，并通过统一银行业务覆盖整个地区。但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却让这个观点画上了问号。紧密连接政府与银行的行动、机构重新苏醒。这样看来“监管”和“抑制”两者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本文原题为“Europe between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regulatory capture”。本文作者 Stefano Pagliari 为滑铁卢大学教授，Shahin Vallée 为 Bruegel 访问学者，Éric Monnet 为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博士后和 Bruegel 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金融的未来：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与基础设施需求

Ding Ding, W. Raphael Lam, Shanaka J. Peiris/文 李想/编译

导读：近几十年来，亚洲面临着人口结构变迁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两个重大挑战。本文作者认为，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一体化，亚洲的金融部门可以在应对这两个挑战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强调金融发展的好处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编译如下：

1、人口结构变迁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变迁，而且各国表现各异。一方面，工业经济体大多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抚养比自 1980 年以来已上升 4-21 个百分点，日本、韩国和香港尤为显著。另一方面，除泰国和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可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在这些国家，劳动人口增加一般都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但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将不再随劳动人口上升而上升。

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体：第一，影响劳动参与率，从而影响增长潜力；第二，对于老龄化国家来说，退休金和其他养老支出将给财政支出带去很大压力；第三，人们倾向于在退休时期减少储蓄，将造成总储蓄的下降，投资也会受到影响，而投资和储蓄一起将会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第四，由于老年人口更喜欢风险低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会随风险偏好的改变而变化，金融产品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人口结构影响到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之一是总储蓄。之前有研究表明，在 1960-2012 年间，国内储蓄率随抚养比（65 岁以上老人及 14 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而上升（见图 1），本文作者的回归结果也显示，这一负相关关系在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而且，人均收入和私人信贷需求对国内储蓄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

此外，人口结构变化会影响金融部门发展，而后者是决定储蓄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工业化国家来说，老龄化降低了风险偏好程度，家户需要回报率更为稳定的、更定制化的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而对于仍有人口红利的高增长和高储蓄国家而言，金融部门的发展和创新的有助于将储蓄引导至回报更高并且更具多样性的金融产品上。这些经济体内的金融摩擦和借贷限制可能会鼓励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国内储蓄水平，而金融一体化和金融深化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高回报储蓄选择，来降低类似的限制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因此，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金融市场环境经济体来说，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设施项目的偿还期限常常在 20-30 年，这加剧了期限错配并阻碍长期基础设施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十分庞大，据亚洲开发银行 2009 年的报告估计，亚洲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需求约为 10 年间 80 亿美元，这大约是这一区域年均 GDP 的 4%。

考虑到总人口上升、基础设施缺口庞大的事实，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压力。与此同时，亚洲人口结构的变化或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的金融一体化。老龄化的工业国家对低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工具有着强烈需求，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项目恰好可以提供高回报和稳定的长期回报，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进一步的金融一体化和国内金融深化，或许可以帮助新兴国家应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挑战。

为了具体衡量金融深化和一体化带来的好处，本文作者假设了以下三种情形，不同的情形代表了经济中不同的参与主体。

- 家户金融参与提升。这一情形假设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受流动性限制的家户的比例从 50% 下降到 25%。模拟结果显示，金融参与提升可以带来更可持续和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由于劳动供给和公共投资上升，产出缺口有所下降，通胀压力有明显下降，进口减少。
- 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一情形假设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 1 个百分点。这将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商业投资增加，企业收益提高，分红增加，从而家户收入也有所上升。而且，低成本也使得企业增加产出，对劳动力需求上升，带来工资上涨。
- 主权债务风险溢价下降。这一情形假设新兴经济体主权风险溢价下降 100 个基准点。一般情况下，持续的财政扩张将增加资金成本并挤出私人投资，而如果金融一体化降低了向外借贷的风险溢价，公共投资将更加依赖国外资金，从而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压力，与金融深化的情形类似，通胀和真实利率都不会像基准情形下增长那么多，货币紧缩也更少。

以上模拟结果表明，融资渠道的改善和融资成本的下降，有助于亚洲的新兴国家在宏观经济和财政风险更低的环境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3、金融深化和金融一体化

广义上的金融部门发展，包含金融一体化和金融深化，其含义为亚洲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密切，企业和私人能有更好的渠道参与到金融市场中。相比贸易一体化，亚洲的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风险共担做得还不够好。为了进一步的金融发展，政策制定者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区域内的金融创新和一体化可以改善储蓄分配，并增强各国对外部冲击的适应力。在完善且谨慎的框架和风险定价之下，更为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将老龄化国家的大规模储蓄用于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当中，也可获得更高的回报。同时，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将有助于各国提高风险共担能力。
- 通过改善国内金融参与渠道和资本市场发展，金融深化能够帮助处理亚洲新兴市场中随着劳动人口增加而来的储蓄上升，而且也可以增加金融储蓄并使得家户的借贷更为容易。
-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一体化的加强能够将储蓄引导至最具生产力的投资机会上，但同时也会带来潜在的成本：扩大冲击的传播力度，使得冲击在区域内同步传染，并且使得资产价格和资金流对全球的“推力”因素更为敏感，这些都给金融稳定造成很大挑战。具体来说，当区域内的资本账户更为自由，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规模更为庞大时，政策制定者需要提高警惕，稳固区域安全网，加强国际政策合作，并实施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原题名为“Future of Asia’s Finance: How Can it Meet Challeng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frastructure Needs?”。本文作者为 IMF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的实力与秩序

Michael J. Green 和 Nicholas Szechenyi/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亚洲地区敌对和冲突与日益增强的经济合作和社会建设并存，本文深入研究了这两种动力的内涵及对美国政策的启示，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编译如下：

2014年，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日本《朝日新闻》、韩国《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资助与支持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美国民意动态集团（Opinion Dynamics Corporation）联合进行了一项关于亚洲实力和秩序的调查。CSIS的亚洲专家选取美国、日本、中国大陆、韩国、澳大利亚、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台湾和泰国共11个亚太经济体的“战略精英¹”作为调查对象，并与美国民意动态集团共同设计了在线调查模板。本次调查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4月22日，最终共收回402份问卷。

1、调查的主要发现

第一，实力将向中国转移。79%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一点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但是61%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地区安全有负面影响。53%的被调查者相信10年内，在东亚地区中国将最具实力；43%的被调查者支持美国实力说。5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在10年内将成为他们自己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28%的被调查者则选择美国。作为美国的盟友，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成为其主要的经济伙伴，但他们还是强烈支持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秩序。值得注意的是，83%的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只有43%的美国专家选择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第二，美国仍将保持强势地位。57%的专家认为未来10年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动力仍是美国处于领导地位，韩国和日本的专家最为认同这一点，而大多数的中国专家也持同样观点。只有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中美共管体系。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新加坡的大量专家认为，美国继续主导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专家则认为多元化地区社会将主导东亚地区，但是对在10年内出现这样的社会并不抱期望。只有11%的中国专家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其他的中国专家则认为多元化、中美共管和无垄断势力等更符合中国利益。

第三，美国的重新平衡政策得到广泛支持，但如何实施是个问题。79%的被调查者支持奥巴马政府的重新平衡亚洲政策，而美国专家高达98%的支持率表明重新平衡亚洲政策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尽管这一政策得到了广泛支持，

¹ 战略精英是指对国际和/或亚洲事务的讨论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专家或专家机构。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其效果还存在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有 51% 的专家认为尽管这一政策是对的，但是其实力不足，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只有 24% 的专家认为它促进了地区稳定和繁荣。

第四，领土冲突是区域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有 89% 的专家认同“东亚共同体”，其中持“强烈支持”态度的专家比例为 36-37%。但是调查显示，专家对于在多边组织中建立地区秩序心存怀疑，其中 54% 的专家认为这些年朝着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进步甚微。他们指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大障碍是领土和历史争议。日本专家现在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疑虑最大，但是他们对日美同盟也有一些隐约的攻击。超过 80% 的中国和日本专家认为当政府外交斡旋失败以后，他们的政府应当用武力来对付其领土的外来入侵者。

第五，东北亚在历史问题上缠斗不休。相对于领土争议，韩国和中国的专家更多地关心历史争议。此外，88% 的中国专家，62% 的台湾专家和 60% 的韩国专家认为日本在地区安全上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中国和韩国在对日本的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有一些分歧，80% 的韩国专家认为这一历史问题仍将是外交或政治事务，而 43% 的中国专家认为它可能会演化为武力冲突。

第六，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尽管领土和历史争议明显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担忧所在，而且被认为是社会建设的最大障碍，但是从总体来看，战略专家们最担心经济和金融危机，其中印度尼西亚对此关注度最高；领土和历史争议位居第二，但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日本的专家把它视为最关心的问题；气候变化排名第三。

第七，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得到有力支持。在对本国经济未来具有重要性的经济框架选择方面，亚太经合组织和 G-20 排序最靠前（82%），其次是东盟（81%），第三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75%）。另外调查还显示，很少专家有“赢者得天下”的看法。除了美国的专家认为亚洲地区协议排斥了美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对 G-7 或 G-8 抱有这种观点，所有被调查经济体都有超过 50% 的专家肯定了每一个地区组织的重要性。

第八，当地对民主价值观的支持比较稳定，但美国反倒开始怀疑起来。在选择“以下选项对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性”时，美国专家把人权和妇女权排在最后，把促进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排在倒数第二。美国专家对于这些民主标准热情的减退与亚洲专家支持的增加形成鲜明对比。例如，相对于 2008-2009 年所做的调查，亚洲国家对人权的支持率从 2008-2009 年的 80% 升至 2014 年的 84%，对加强国内政治组织的支持率从 2008-2009 年的 78% 升至 2014 年的 82%。

第九，台湾海峡的和平对整个地区至关重要。尽管在近年来，除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以外（有些时候是美国和日本），海峡两岸的关系不再是重要的对话

课题，但是专家们仍然认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他们国家的利益非常关键。70%的专家认为通过高压手段把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起来不利于他们的国家利益，美国和日本专家持这一观点的比例分别为 99%和 98%，台湾是 89%。中国大陆专家认同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的比例分别是 40%和 43%。

2、结论和建议

推动重新平衡政策的实施。美国领导人应当使盟友和伙伴国相信重新平衡政策真实有效，而且得到充分支持。

建立美国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政治支持。美国政府应当结束目前的谈判磋商，并且扩展 TPP 的新成员。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应展示建立美国国内对于 TPP 政治支持的意图和能力，在每次谈判结束后政府应当予以批准。

向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回归价值。在实现重新平衡的目的中，恢复人权、自由和公开选举等价值观，以显示美国对于民主盟友的承诺。

继续努力缓解历史问题的紧张。亚洲战略精英对历史问题，尤其是东北亚历史问题仍高度关注。这些问题在将来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所有国家都重视民主政治，但是日本可能会继续保持民主谨慎性和敏感度。

关注泰国局势。泰国国内局势不稳定是一个挑战，共同的利益、目标和预期是美-泰同盟的基础，没有良好的政治气候，美-泰同盟将不会持久。

加强美印关系。基于美国和印度专家在亚洲经济、安全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观点，美国和印度这两大民主国家是天然的伙伴。即将上台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给美国政府一个改进美印双边关系的机会，其中经济关系应该加速发展。

鼓励中国扮演建设性安全角色。尽管多数亚洲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中国的邻国对其安全行为表示日益担心。美国及东亚地区国家应当鼓励中国扮演建设性安全角色，特别是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在这次调查中，中美专家在很多领域都有相同的观点，加深在这些领域的双边关系极为重要。

继续支持区域组织建设。在过去五年，东亚地区专家（特别是 ASEAN）越来越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信任和相互理解、共同外交政策、国防和安全合作。美国应继续支持东亚区域组织建设，这有利于把整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增强区域稳定和安全。

本文原题为“Power and Order in Asia”。本文作者 Michael J. Green 为 CSIS 亚洲和日本委员会高级副主席，Nicholas Szechenyi 为 CSIS 日本委员会副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7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超级条约——大型经济体间的区域贸易协定

Chunding Li, Jing Wang, John Whalley /文 陈博/编译

导读：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不少涉及全球超大型经济体，我们将这些协定称为超级条约。作者通过考察正在进行和潜在的超级条约，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可能会有分化，但条约一旦签订，对增长和贸易的作用都非常巨大。同时，中国所受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贸易以维持增长。编译如下：

“超级条约”通常指体量巨大的经济体之间签订的贸易条约。典型的例子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本篇文章讨论的对象就是这类条约以及它们的影响，并特别探讨中国在其中的地位。

自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后，越来越多的区域性贸易条约开始涌现。到 2014 年 1 月为止，世贸组织就记录下了 583 条区域协定。这其中大部分是小国家之间以及小国家和大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主要的动机在于获得并保障跨国市场的准入。大型经济体之间签署的条约相对较少，少数的例外包括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条约以及 NAFTA。自去年以来，随着 WTO 谈判进程止步不前，加之 OECD 国家之间对增长的需求越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区域性贸易谈判开始涌现。而且，不少小国家加入贸易协定的本意就是为了进入大国的市场，这些小国现在已经开始直接和大国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

不同人对超级条约的定义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以经济体量为标准。欧盟和东盟常被算作一个单一经济体。在表 1 中，我们总结了国与国之间正在谈判中的贸易条约（U, under discussion）和已经达成的贸易条约（P, in place）。

Table 1: Mega Deals in Place / Under Negotiation or Discussion Pairwise for G20 Members

	EU	USA	CHN	IND	JPN	RUS	BRA	MEX	KOR	CAN	ARG	AUS	IDN	SAU	TUR	ZAF
EU	-	U		U	U			P	P	U			U		P	P
USA	U	-	U		U			P	P	P		P	U			
CHN		U	-	U	U				U			U	P			
IND	U		U	-	P		P		P	U	P		P			U
JPN	U	U	U	P	-			P	U	U		U	P	U		
RUS						-										
BRA				P			-	P			P					
MEX	P	P			P		P	-	U	P		U				
KOR	P	P	U	P	U			U	-	U		U	P		P	
CAN	U	P		U	U			P	U	-		U				
ARG				P			P				-					
AUS		P	U		U			U	U	U		-	P	U		
IDN	U	U	P	P	P				P			P	-			
SAU					U							U		-		
TUR	P								P						-	
ZAF	P			U												-

· Authors' compilation based on Coy (2013), Greenberg (2012), Jianguo (2012) and WTO (2014).

在表 2 中，我们衡量了超级条约对参与各国的影响力。衡量的对象变量为受影响的贸易总量。

Table 2: Trade Coverage of Potential Mega Deals

	Total exports by country covered by agreements in place pairwise or regional (in %)	Total exports by country covered by agreements either under negotiation or discussion (in %)	Total exports by country covered by agreements among group members yet to be considered (in %)
The 10 largest economies globally by GDP	16.4	26.4	57.2
Member of the G20	19.1	26.7	54.2
The 10 largest trading entities in WTO trade data	22.7	27.9	49.4
Economies with GDP of over US\$1 trillion	22.1	28.6	49.3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the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UN Comtrade) data (UN 2014).

第二列衡量的是已经在谈判进程中的条约，第三列是还没被公开讨论或考虑的条约。可以看到，用什么标准来界定超级条约对结果的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全球贸易主要被最大的几个国家所主宰，把小国囊括进统计所造成的影响有限。

现在我们来具体关注中国、欧盟和美国在超级条约中的地位。我们预计谈判中的超级条约最终将包括货物、服务和投资等多个组成部分，并涵盖知识产权、农业竞争规则等具体内容。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额外的服务贸易特别协定或投资协定。不少超级条约已经进入到了工作小组协商的实质阶段，其中包括了不少远远超出 WTO 范围的条款，比如人员的跨国流动等。美国还提出对监管框架进行统一，并讨论了国有企业的地位。这些都将是和传统的 WTO 条款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也很有可能提出一些新的谈判内容，比如如何对待反倾销措施、资本管制开放以及海外资产所有权。

中国在超级条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目前中国只有一个和东盟缔结的超级条约——中国-东盟条约。

Table 3: Existing and Prospective Mega Trade Deals for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 Partners Have GDP above US\$1 Trillion)

China	EU	US
In Place		
ASEAN-China	EU-Mexico EU-Korea	US-Canada-Mexico NAFTA US-Australia US-Korea
Under Negotiation or Discussion		
Australia-China (RCEP) China-Japan-Korea China-India China-US (not officially started, but has been discussed in media or research papers)	EU-ASEAN EU-US TTIP EU-India EU-Japan EU-Canada	US-EU TTIP US-Japan (under TPP) US-ASEAN (effectively under TPP) US-China

Source: World Bank (2013).

表 4 显示了一旦这些条约缔结将对三个经济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基本上贸易覆盖量的提升都在三成左右。而对于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情况不同，贸易覆盖量的增加超过了现有的超级条约的覆盖量。这或许说明了超级条约对中国的意义更加重大。

Table 4: Trade Coverage of Mega Deals (as of 2012)

	China	EU	US
Value of Imports (US\$ billion)	1818.2	2301.1	2333.8
Value of Exports (US\$ billion)	2048.8	2166.4	1545.6
% of Imports Covered by Trade Agreements in Place	21.1	25.7	34.1
% of Exports Covered by Trade Agreements in Place	31.3	29.5	46.0
% of Imports Covered by Possible Mega Deals plus Agreements in Place	53.2	51.0	81.9
% of Exports Covered by Possible Mega Deals plus Agreements in Place	64.3	59.6	80.2
Incremental Coverage of Imports by Possible Mega Deals (%)	32.1	25.3	47.8
Incremental Coverage of Exports by Possible Mega Deals (%)	33.1	30.1	34.2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using bilateral trade data from UN Comtrade database (UN 2014).

下面，我们再讨论超级条约对贸易壁垒的影响。下表首先展示了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关税成本。

Table 5: 2011 MFN Tariff Rates for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rade Weighted Average Tariff Import	Simple Average MFN Applied Tariff	Exports to Major Partners and Tariffs Faced (Weighted Average for 2011)
China	4.1 (2011)	9.6 (2011)	European Union: 3.5 Japan: 3.0 United States: 2.9 Hong Kong: 0 Korea: 7.5
European Union	2.7 (2011)	5.5(2012)	United States: 1.2 Russia: 10.0 Switzerland: 2.3 China: 7.9
United States	2.1(2011)	3.4 (2012)	China: 5.5 Mexico: 9.6 Canada: 3.0 Japan: 4.1 European Union: 1.6

Source: WTO (2013). The weighted average tariffs of exports to major trading partner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authors using data of total export volumes and weighted average tariff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non-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orld Tariff Profiles 2013*.

可以看到，由于欧盟和美国本身的关税成本较低，超级条约的效用相比于中国要更低一点。

表 6 显示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表中的贸易成本由 Li 和 Whalley 计算所得，使用了贸易引力模型来推算国与国之间贸易品的价格差。

Table 6: Ad Valorem Tariff-equivalent Trade Costs Between Large Countries in 2011 (%)

Country	US	EU	China	Japan	Canada	India
US	-	25.3	26.5	34.4	15.1	85.4
EU	25.4	-	26.8	42.3	40.8	72.8
China	26.5	26.8	-	25.2	42.7	73.3
Japan	34.4	42.3	25.2	-	51.5	102.9
Canada	15.1	40.8	42.7	51.5	-	1.194
India	85.4	72.8	73.3	102.9	119.4	-

Source: Li and Whalley (2013).

表中的结果显示贸易成本相较于关税来说非常之高。这意味着贸易谈判不能仅仅关注关税，而需要涵盖更广泛的议题。第二个有趣的现象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差距十分之大。

• 中国的角色

从现有的资料很难推断出中国会和谁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加入超级条约。中国既没有参与，也没有被邀请参与 TPP 的谈判。而且超级条约的谈判时间会非常之长，不可预料因素众多。我们或许可以以中国-东盟条约为基准来推想中国在超级条约中的地位。这一条约中，关税削减是重要组成部分。签署之后，东盟市场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从 12.8% 下降到了 0.6%，中国对东盟征收的关税从 9.3% 下降到了 0.1%。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关税之外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更加重要。这些议题包括商业机密的保护、汇率操纵和国企行为等。

• 超级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超级条约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于，由于被排除在现有的两大超级条约谈判（TPP 和 TIPP）之外，中国可能会加速寻求建立自己的区域性贸易条约。其次，超级条约能够有效的促进贸易增长，这对于经济增速下行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市场准入是另一个重点关注的部分。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屡屡遭受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占比在全世界达到 40% 以上的国家，且越来越多调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因为它们和中国的贸易流量正在快速上升。也因此，中国和发达国家加入超级条约的原因可能会有所不同，市场准入是中国关注的重点。

本文原题为“China and Global Meta Trade Deals”。本文第一作者 Chunding Li 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7 月刊于 CIG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联盟中的协调和危机

Mark Aguiar、Manuel Amador、Emmanuel Farhi 和 Gita Gopinath/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本文是一篇工作论文，主要分析了在主权债务市场存在潜在展期危机时，货币联盟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特征。作者首先描述了在缺乏承诺条件下导致的财政外部性，即引起成员国过度借贷；这种外部性支持了货币联盟中强制性债务上限的合理性。然后，考察了货币联盟中债务构成如何内生地影响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作者发现当高债务国家加入中等负债的混合联盟，且其他成员都是低负债时，将带给该国更强的危机免疫能力和更高的福利水平。本文的结论挑战了传统理念，即所有国家都偏好于拥有低债务成员的联盟。这些结论为当前债务危机中的最优货币区标准提供了新视角。编译如下：

欧元区以集中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为特征。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突出了众所周知的问题：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中的非对称性。该问题最早由蒙代尔（1961）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所阐述。然而，当异质性主权债务被置于货币联盟中时，将对货币政策带来影响并由此引发冲突，此次危机将这一以往缺乏了解的问题带到研究的前沿：例如对于如何处理高负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就存在非常大的分歧。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他关心的是如果欧洲央行承诺购买外围危机国家的主权债务，由此对财政和通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危机中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则认为最后贷款人有义务来免除或减缓具有自我实现特性的债务展期危机。

1、环境设定

环境设定包括单个财政当局选择通过发行多少名义债券来进行消费和借贷。共同货币当局在其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基于联盟来选择通货膨胀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没有进行承诺。缺乏承诺的财政政策导致了违约的可能性。缺乏承诺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央银行很容易受到诱惑，通过通胀来降低其成员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在根据事后情况选择最优政策中，货币当局需要权衡通货膨胀的扭曲成本和债务削减的收益。如果借款者识别出这种诱惑，并事前收取更高的名义利率，将使得事后的通货膨胀自我失效。

2、财政政策的外部性

承诺和协调的双重缺失引起货币联盟中财政政策的外部性。货币当局通胀的动机依赖于联盟总体债务的总量。联盟中的每一个国家借款决策并不考虑其对总体债务和通胀形成的影响。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坚持有限承诺的假设条件下协调性地作出决策；对此与无承诺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货币联盟导致了更高的债务，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低的福利水平。虽然货币联盟通过协作能够消除财政政策的外部性，但不能重新进入完全承诺条件下的路径。无论财政政策协作与否，货币政策中的完全承诺将达至最高的福利水平。这两种情况允许我们分解货币联盟中分别由协调缺失和承诺缺失所导致的福利损失。财政政策的外部性存在支持了货币联盟中强制债务上限的合理性。

3、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的构成

在这种背景下，置于债务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分析，需要考察货币联盟的构成情况。特别地，考虑分别由高负债和低负债经济体组成的联盟，他们在初始组成货币联盟时具有不同的负债水平。首先考虑没有债务展期危机的情况，借款者之间没有因为到期债务展期的协调而失败。虽然通货膨胀是为了减轻成员的实际债务负担，但不管负债水平如何，所有成员都倾向于归属于低负债的货币联盟。这是因为在一个高负债的货币联盟中，共同货币当局试图事后通过通胀来实现债务减免，但借款者预测到高通脹，事前就会定一个更高的利率。结果，联盟中的成员并未获得任何债务减免，反而因通货膨胀而产生净损失。低负债的货币联盟更接近完全承诺情况，即具有低的通货膨胀和低的名义利率。高负债成员国认识到他们将以较低的利率对其名义债券进行展期，从而受益于加入一个低负债的货币联盟。

如果考虑债权人对到期债务展期无法进行协调，这将使得高负债水平成员可能爆发自我实现的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一个权衡会员资格的标准。在没有债务危机的基准中，一个低负债的联盟可以令人信服地承诺低通货膨胀，从而提供低名义利率和产生低程度的扭曲。然而，在存在债务展期危机时，货币政策不但应该维持平稳时期的低通胀，还应该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职责以消除债权人的协调失败。主要由低负债成员组成的联盟的货币当局可能不愿意在发生危机时采取通胀目标，因为通货膨胀是以所有成员更高的通胀为代价，并且只对高负债成员国有益处。也就是说，尽管低负债成员国承诺在经济向好时提供低通胀，但它削弱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可信度。因此，高负债经济体更喜欢其货币联盟中相当大部分的成员也有高额债务，以平衡对低通胀的承诺与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承诺。

重要的是，货币当局在危机时采取通胀的预期，让我们无需进行真正的通胀，就可以消除一个自我实现的危机。这使人想起在 2012 年夏天的事件，当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后，使得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的借贷成本大幅减少。欧洲央行无需购买任何困境国家的债务，就可以为类似于一个自我实现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上了一道保险。

解释这些发现的一种方法是考虑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观察其决定是加入货币联盟还是独立控制其货币政策。没有展期危机条件下，加入国家最好加入较低总债务的货币联盟，因为该联盟的货币当局将提供低通胀。这是加入一个更大信誉以保持低通胀率的货币当局联盟的典型理由。相比之下，存在自我实现展期危机时，某国通过加入中等水平总债务的货币联盟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与加入低总负债联盟相比，这降低了其自我实现危机的脆弱性。

重要地是，通胀的信誉可以内生地影响货币联盟的债务结构。这些结论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和货币政策制度设计的相关文献提供新视角。罗格夫(1985)强调

将金融管理局委托给一个中央银行家的优点，因为其目标函数可以根据社会的不同进行调整以便获得通胀信誉。然而，如果社会不同意中央银行家的目标，要实现这样的代表可能很困难。这里我们从货币联盟成员的债务特征如何内生的影响通胀货币当局的公信力。

4、结论

持续的欧元区危机使得人们强烈关注货币联盟内在矛盾问题：单个国家控制财政决策，但货币政策则是最大化整体福利由联盟货币当局决定。广为人知的是，单个国家在加入到其成员国商业周期非同步的联盟时将变的更糟糕，因为作为联盟共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符合不同国家的需求。特别是，当这些国家在债务市场面临债务违约危机时，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

货币当局可以用意外的通货膨胀来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从而消除展期危机。是否会选择这样做，这样做是否能有效，这取决于联盟总体债务水平。如果联盟的总体债务水平很低，货币当局无论在稳定时期还是在危机时期，都不会选择通胀。在另一个极端，如果联盟的总债务很高，货币当局一直都保持通货膨胀，因此未能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当有一个中间水平的总债务，货币当局在正常时期选择低通胀和在危机时期采用高通胀，由此产生意外的通货膨胀，从而防止债务危机。当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处于这样一个联盟：即其他成员国家都与他一样负债累累或者其他国家负债水平都很低时，他不可能从货币当局得到帮助以应对其债务危机。类似于“希腊”的国家在一个拥有一些类似“德国”的联盟中将变得更好，但是并不是所有其他成员都是“德国”式的。

这种构成可以给“希腊”式国家提供低通胀，并免除其暴露在自我实现的危机之中。重要的是，如果使用非均衡路径的通货膨胀，上述目标可以在对“德国”式国家不造成任何福利损失的情况下达成。

显然，当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足够低的时候债务危机将消失。然而，财政外部性的存在限制了单个国家减少其债务的动力。这是因为他们没能将其债务内化到影响联盟货币当局膨胀的动力之中。因此相比于一个控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独立国家，他们最终积累的债务要更高。

本文原题为“Coordination and Crisis in Monetary Unions”。本文作者 Mark Aguiar、Manuel Amador、Emmanuel Farhi 和 Gita Gopinath 分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剑桥大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7 月刊于 NBER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对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担忧

Yifan Hu/文 苏丹/编译

导读：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 10 个省（市）地方政府今年内可实施自行发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我国正在探索地方政府发债新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稳定、规范的发债渠道，逐步向自主发债模式过渡。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市场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开闸”存在担忧。编译如下：

5 月 19 日，财政部公布，经国务院批准，2014 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等 10 省市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自发自还是指，试点地区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本地区政府债券发行、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机制。在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的 10 个地区中，广东成为首个发债地区。广东省今年共持有 148 亿元债券发行额度，分 59.2 亿元、44.4 亿元、44.4 亿元三期发行，对应债券期限为 5 年、7 年、10 年三个品种，年利率分别是 3.84%、3.97% 及 4.05%。三期债券都在 6 月 23 日进行招标工作，随后，债券将开始计息、分销。随着广东省自主发债的起跑，预计其余省市的自主发债工作也会逐步展开。

基于未清偿债务、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状况、财政收支情况、总体债务状况及管理等方面的考虑，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公司给予广东省政府债券的评级为 AAA 级，即最高信用等级。这一评估结果表明了评估公司对广东省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财政缓冲水平以及低违约风险的信心。

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表明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纪元。直接债券的发行不仅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一个更为健康的融资渠道，也减轻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领域收入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为推进城市化，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由地方政府实施，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可以缓解政府大量的资金需求。此外，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方式相比，自行发债可以强化市场对政府债务的筛选机制和约束作用。

然而，市场对于这一政策普遍存在担忧。首先，政府仍然没有公开筹集资金的用途，使得公众难以依据不充分的信息来预测政府支出是否合理，以及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不过，这一情形有望逐步得到改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提出，要将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作为优先考虑的改革目标。目前，山东试点实行的一项改革要求，到 2015 年全省所有市县政府预算都要做到全部公开，以便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另一个担忧则来自对广东省政府总体债务水平信息的缺失。去年末进行全国调查之后，国家审计署理应提供相关的统计信息，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关

于这方面的任何说明。没有清晰的数据统计结果，投资者很难对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

这也引发了对信用评级系统的担忧：在没有任何关于总体债务水平信息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就给予广东省政府 AAA 级别，这一行为大大降低了评级体系的可信度。因此，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很可能会加剧地方财政收支的不可持续度。未来几年，中央政府应对此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如设置债务占 GDP 比重上限等。

尽管存在上述担忧，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仍然是中国财政改革非常关键的一步，将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可持续的财政收支平衡。

本文原题为“A Step Forward fo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Debt”。本文作者为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产业集聚与产品创新

Hongyong Zhang/文 孔莹晖/编译

导读：作者对产业集聚与产品创新的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能够促进中国的产品创新，而地方化经济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编译如下：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通过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来提高生产率和促进企业创新。其中，地方化经济是指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集聚所带来的好处，城市化经济是指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许多学者对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但鲜有关于集聚和产品创新的研究。Feldman 和 Audretsch (1999)、De Beule 和 Van Beveren (2010)是两个为数不多的代表。Feldman 和 Audretsch 的研究发现，关联产业因科学技术共享而倾向于在同一城市集聚。在美国，多样化对新产品开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专业化则具有反向作用。De Beule 和 Van Beveren 对比比利时企业的研究发现，同一行业集中就业对新产品开发具有正向作用。然而，他们的研究只考虑了地方化经济。

产业集聚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创新呢？如果可以，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如何从集聚经济，即地方化经济和/或城市化经济中得益的呢？尽管关于中国工业集聚程度提高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鲜有关于集聚对促进产品创新的影响的研究。作者（张红咏，2014）基于 1998-2007 年中国企业数据，探讨了集聚经济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

1、集聚与产品创新的衡量指标

作者借鉴 Martin et al. (2011)的研究，从产业-城市层面选择集聚经济的变量，采用某城市同一产业相邻企业的就业人数作为衡量地方化经济的指标，采用该城市其他产业就业人数及产业多样性作为衡量城市化经济的指标。

国家统计局关于“新产品”的界定如下：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结构、材质、工艺等有所突破，从而产品性能显著提高或使用功能显著扩大的产品。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2、新产品的地理分布

如表 1 所示，中国各省份的新产品产值、新产品强度和有研发新产品企业的占比存在显著差异。沿海省份（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新产品产值显著高于内陆省份。至于新产品强度，与 3.6%的各省平均值相比，北京（19.2%）、天津（10.5%）、四川（9.1%）、重庆（8.3%）和浙

江（7.4%）是最具创新性的；而海南（0.4%）、内蒙古（0.5%）、西藏（0.8%）和新疆（1.3%）则最乏创新性。此外，北京、天津、浙江、重庆、四川的新产品企业占比最高，比例约为 20%；而内蒙古（1.1%）、福建（2.6%）和海南（2.9%）的这一占比最低。这表明，中国的产品创新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表 1 2007 年中国各省份的产品创新

Province	New product output (billion RMB)	New product intensity (%)	Share of new product firm (%)	Number of firms
Average of all provinces	129.4	3.6	8.4	9,823
Beijing	290.0	19.2	26.0	5,681
Tianjin	308.7	10.5	20.8	5,210
Hebei	61.6	1.4	3.7	9,289
Shanxi	29.4	1.8	4.8	2,363
Inner Mongolia	7.7	0.5	1.1	2,448
Liaoning	176.1	2.5	6.2	14,441
Jilin	169.9	5.8	13.6	3,327
Heilongjiang	34.0	2.4	5.6	2,594
Shanghai	338.6	2.4	5.5	14,143
Jiangsu	370.2	1.6	4.0	40,742
Zhejiang	527.5	7.4	19.4	50,130
Anhui	72.8	4.1	8.6	7,216
Fujian	77.0	1.0	2.6	13,963
Jiangxi	26.1	1.3	3.7	5,158
Shandong	338.9	2.1	4.9	33,879
Henan	69.4	1.5	4.1	11,363
Hubei	98.3	2.6	7.0	7,829
Hunan	72.1	3.1	7.8	8,389
Guangdong	485.2	2.9	6.7	40,780
Guangxi	48.4	2.9	7.3	3,737
Hainan	0.4	0.4	2.9	376
Chongqing	129.3	8.3	19.7	3,371
Sichuan	183.2	9.1	24.5	8,696
Guizhou	7.8	1.7	7.0	1,483
Yunnan	14.4	2.3	6.5	1,906
Tibet	0.0	0.8	4.2	48
Shaanxi	46.2	2.9	9.4	2,543
Gansu	15.3	3.5	9.0	1,308
Qinghai	0.8	1.5	4.3	302
Ningxia	4.3	2.4	7.3	629
Xinjiang	6.9	1.3	3.1	1,158

注：新产品强度是指新产品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

3、城市化经济而非地方化经济促进了中国的产品创新

作者构建的新产品开发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产业多样性）对新产品开发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反，地方化经济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城市化经济对新产品产值和新产品强度的贡献也大于地方化经济。所有的回归都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规模、平均工资、所有权、

产品补贴这五个控制变量来控制地方竞争程度和企业自身特征。显然，产品创新不仅由企业自身能力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经济（这里是城市化经济）的影响。

为了考察所有权和所属产业部门对产品创新是否有影响，作者将样本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产业几个子样本。城市化经济、规模和多样性对新产品开发的可能性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城市化经济对内资企业的贡献大于外资企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大于其他产业。

4、政策建议

不同产业的集群能有效促进产品创新。决策者可以通过鼓励企业选址在具有多样化产业的地区来促进产品创新。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60多座城市建立了100多个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苏州工业园等大部分的开发区都不仅仅是单一的二位数或三位数产业的企业集聚。产业间外包、知识溢出和中间产品采购的深化可以降低新产品开发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产品创新。

本文原题为“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n China”。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7月21日刊于VOX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政治改革：选举、公共物品和收入分配

Monica Martinez-Bravo, Gerard Padró i Miquel, Nancy Qian 和 Yang Yao/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为解决对地方官员监管不力的问题，中国在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采取了乡镇选举的政治改革。此项措施不仅对提高地方公共物品的投入有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总体上起到了对地方官员更好的监控作用。编译如下：

由于缺乏对地方官员的监管信息，掌控整个官僚体系着实不是易事；尤其在独裁制国家中，民众反馈渠道的不完善使得这种监管和控制更加困难。近些年，地方选举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渠道，而中国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监管力度薄弱等因素，地方官员会懈怠对公共物品（如教育）的筹资，抑或通过诸如土地、乡镇企业等渠道来为自己及亲友谋利。作为应对，在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中国采取了乡镇选举的方式，期望通过用连任来激励官员采取亲民的政策措施，从而解决监管问题。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些选举如何改变对官员的激励。作者建立了乡镇民主调查（Village Democracy Survey），得到了自 1982-2005 年覆盖中国 29 个省约 200 个代表性乡镇的面板数据。这是系统性记录乡镇财政与政治结构变化的最完整数据，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国家定点调查（National Fixed-Point Survey）的经济数据作为补充（其样本对象与 VDS 相同）。

为了建立选举的因果效应，作者利用了两个中国环境下的特点。首先，引入选举的时点与乡镇本身的特征无关。其次，脱离于乡镇级别的选举制改革不伴随有上级政府的政策变化，也不对乡镇官员的法定权力产生影响。实证研究的部分主要按以下三步骤进行：

1、证明了乡镇引入选举的时点与其特征变量是不相关的。这与所谓改革的强制性，即并不考虑乡镇特殊性是相一致的。

2、控制可能的干扰项，将每个乡镇第一次选举前后的结果基于乡镇是否已经引入选举制来作比对。因果性的解释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如果没有选举制改革，不论何时实施第一次选举，不同乡镇的结果都将是类似的。

通过分析，得到如下三个结果：

- **乡政府在公共物品上的财政支出**

在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主要由地方官从乡镇中筹资获得，而这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般认为地方官员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选举制的引入使得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上的总支出提高了 22071 美元，大约等同于样本中各乡镇一年的平均支出，而这完全来自于当地人的资金支持。相反地，在选举制前后，上级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拨款则没有改变。

• 土地利用

乡镇土地都是集体所有的，绝大多数由地方官来分配给家庭作为长期租约。同时，一部分土地也可以租给开发商；所获得的利益本应当使所有居民平等享有，但由于这些操作的不透明性，使得官员中饱私囊成为可能。因此，作为居民，自然希望所有土地都能够分配给自己。作者发现，选举制的引入使得承包给开发商的土地减少了约 3.8 公顷，大约是样本中此项均值的一半。

• 家庭收入

如果选举制系统性地减少了精英人群，那么，选举制也同样会降低富裕家庭对贫穷家庭的相对收入。作者发现，选举制的引入对最贫穷的 50%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然而，（从低到高）90%分位上的家庭收入减少了 722 美元，约为样本均值的 20%。因此，中位家庭与 90%分位上的家庭，其收入比率增加了 1.7%。这种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与已有精英阶层随着选举制引入而恶化是一致的。

可见，选举制的引入使得地方官员对选民更加负责，这与上述的结论也是相一致的。被选上的官员将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同时将土地分配给家庭而非开发商，因为这可以取悦大多数人。随着政策不再偏向于精英阶层，选举制也意味着降低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

基于这些发现，作者进一步考察了那些可以提高公共物品支出、减缓收入不平等成都的政策。选举制使得家庭在当地的消费提高，这与居民在公共物品上消费更多是相统一的。然而，由于服务费用本身仅占收入的一小部分，加之它在各收入水平中保持不变；服务费用比重小且缺乏阶梯性，意味着它不是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政策手段。

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强制征税的合法权利，收入再分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对生产活动本身及相关财产的再分配，这包括就业、土地、企业。与此相一致地，家庭收入比例的变化与农业、私营企业的收入变化是呈平行关系的。

3、最后，作者考察了选举制带来这些结果的原因。

根据政治责任相关的文献，选举制带来良好的结果主要有两种机制：连任激励和官员竞争。作者发现，这二者同时存在。前者表现为，在没有领导人调换的乡镇，选举制依然带来了良好的结果；后者表现为民众会选择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领导人。

总之，我们的结果显示，较之政治体制下的监管，选举制使得地方官员受到更好的控制。

本文原题为“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Elections, Public Good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本文作者分别来自货币金融研究中心、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北京大学。本文于 2014 年 7 月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习—莫迪会谈：一种新型的中印关系？

Hoo Tiang Boon/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在最近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习—莫迪会谈反映了莫迪当选印度总理以来，中印关系的好转。两国关系会限制于经济因素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新变化呢？现编译如下：

1、评论

最近在巴西的福塔莱萨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双方领导人表示将努力解决中印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莫迪形容此次会谈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同时习近平也称赞印度是中国的一个长期友好伙伴。

习-莫迪会议反映了自从莫迪上任印度总理后中印关系的好转，事态的积极发展引起观察员对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关系的关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否看到中国和印度之间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

2、中印经济关系

经济因素在塑造中印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这些亚洲大国之间的商业关系还是比较适中的。2013年中印贸易额大约在650亿美元，在双方保持经济合作的状态下，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会渐渐超过10万亿美元。去年是双边贸易额跌幅的第二年。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

莫迪总理曾经以承诺复兴印度的经济而成功获选，将会把目光投向北京，把中国作为实现“印度梦”的可行性合作源。“莫迪欢迎来自中国的更大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目前，双方已签署了关于建立合资工业园区，为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的相关协议框架。莫迪也将寻求推动印度IT和医药产品在中国更大的市场准入，以解决去年大约31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问题。

北京已同意采取措施解决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仍然是其全球外交政策中最有效的工具。中印关系也不例外，北京将继续促进双边经济合作。中国外汇储量高达3.8万亿美元，而且把印度看做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渴望对其进行更大的投资。这符合中国通过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国建立一个东亚经济走廊的野心。

虽然中国的许多经济关系是由精明的实用主义思想推动，个性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把莫迪看成一个老朋友，认为可以和他合作。中国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莫迪在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就曾多次出访中国，并就国会对中国投资作出了积极努力。如今，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也大量集中在古吉拉特。

3、战略思考

尽管经济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能单独以此定义复杂的中印关系。其他重要的战略因素也在发挥作用。目前中国领导层将印度视为其全球范围内一个显著的地缘和外交政治因素，习近平主席将印度视为中国的一个优先方向。中国外交部引述习主席得建议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在东亚地区声誉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西部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能不能进一步加强与其西部邻国的关系，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北京也意识到了莫迪和东京有着良好的关系，同样，安倍政府也渴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如果印度和日本靠拢，那将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于新德里，与中国改善关系将有助于提升其在地区政治中的谈判地位（尤其是有关巴基斯坦的问题方面），增强其独立大国的实力；并扩大在诸如反恐等领域中双边安全合作的机会。

促进融合并不意味着现存的问题，比如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将变得不那么重要。与此相反，这些问题将会继续在中印双边关系中蒙上一层阴影，这甚至可能会使双方关系回到以前的状态。

尽管如此，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地信号，一些传统上难以解决的难题可能会进一步松动。在边界问题上，中国已表示准备与印度达成‘最终解决’的共识，以高度友好的态度应对新的莫迪政府。

4、乐观的前景

总体而言，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这是中印关系的发展轨迹之一。西藏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将继续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但是，随着两国经济合作的加强，北京和新德里进一步改善了双边关系，中印关系似乎出现了持续友好的前景。中国外交部长员兼习主席的特使王毅，在出访印度期间将中一印伙伴关系比喻为一个“巨大的宝藏”，也许这个宝藏即将被揭开。

本文原题为“Xi-Modi Talks: A New Type of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本文作者胡江恩（Hoo Tiang Boon）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本文于2014年7月24日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